

★广州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中共

DONGJINGZHIBU

东京支部

1935—1938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3年1月

★广州中共党史研究丛书

中共 东京支部 1935-1938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3年1月



▲ 林基路 (1916年4月—1943年9月)

陳潭秋.毛澤民.
林基路烈士永垂不朽!
鄧小平題

▲ 邓小平为林基路等题字。



▲ 1936年11月，为追悼高尔基，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和日本左翼剧团新协剧团及新筑地剧团在东京筑地小剧场公演，演出结束后演员合影留念。



▲ 1937年1月，“中华留日戏剧协会”在日本东京一桥讲堂演出《复活》。



▲ 1937年2月14日，中共东京支部动员几百名中国留日学生到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愿，要求确认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是留日学生的合法组织。斗争取得胜利。图为留日学生请愿队伍。



▲ 1937年5月24日，东京“文化座谈会”部分成员摄于早稻田大学门前。



▲ 中共东京支部先后5名支委，支部书记林基路、宣传委员官亦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余下3名支委于1982年合影留念。左起：梁成林、陈健、陈洪潮。



▲ 1989年春，留东同学会复会，梁威林、邓楚白、李云扬、古子坚、伍乃茵、潘沃权等留东同学合影留念。

前 言

中共东京支部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上海文化系统的中共负责人周扬领导下，由林为梁主持，在日本东京的中国文化人和留学生中秘密建立的中共组织。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纠集大军对工农红军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到处搜查、破坏革命组织，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禁止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党组织遭受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在国内难以立足，被迫东渡日本，到当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图书馆”的东京寻求真理，为以后回国革命打好基础。于是，东京一时成为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左翼文化人在国内遭受迫害打击之后的流向地和聚会点。中共东京支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成立的。

中共东京支部从1935年9月成立到1938年初结束，存在虽仅两年多，但在团结流亡日本的左翼文化人和留学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开展进步文化传播和抗日宣传等活动中，发挥了骨干和核心的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他们先后回国投身抗战，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许多人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甚至壮烈牺牲。他们的事迹，为中共党史和革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学界对这一段历史在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还有待深入。尤其是中共东京支部的许多党员是广东、广西籍的青年，后来回国抗战，又有20多名党员的组织关系由中共广州市委接收，因而，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与中共广东党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可见，编辑出版有关中共东京支部的历史资料，对完整地保存革命史料，使学界进一步丰富对中共广东党史的认识，以及向青少年进行光荣革命传统教育，都是很有必要和十分有意义的。



本书以《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共东京支部》一文作为核心文章，所选编的史料，都与该文提及的人和事有关，且除烈士传略外，基本是历史亲历人的回忆。这些回忆者如今大多已去世，且当年撰写的回忆录，又有不少并非专门就中共东京支部而回忆，因而，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对原回忆录有所删节，只选取与本书有关的内容。另外，由于事情发生至今相隔已有70多年，可资查证的历史档案又相当稀缺，因而回忆资料中对当年的某些人和事难免有不同说法。为保持史料的原貌，编者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文不作修改，仅在某些有明显失实或交代不清楚之处，以注解说明，并在《活动纪事》的记述中，表明编者对这一段历史中的观点及人和事的认识。比如，关于东京支部的名称，有的用“中共东京支部”，有的用“中共留日支部”，还有的用“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等等，但编者在《活动纪事》中按《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共东京支部》一文的提法，一律用“中共东京支部”，以此表明对这一组织名称的认识。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共东京支部成员后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此前，他们就为追寻父辈的足迹，多次召开座谈会，并往台山——林基路烈士的家乡，向台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收集资料，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并且不辞劳苦，帮助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为编辑本书，编委也曾先后多次召开会议，编者还到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收集资料，得到纪念馆工作人员热情接待。在此，谨对所有帮助、支持过本书编辑出版的有关单位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错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3年1月

序

曾庆榴

本书所说的中共东京支部，档案记载称之为“日本文委党的组织”。该支部的成员之一陈健在他本人所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和“简历”中，曾称之为“留东党委”或“中共留日支部”。1982年，东京支部健在的成员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称之为“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有的报刊文章将其称为“共产党的东京中国文化支部（东京党支部）”。从实际情况看，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在压迫重挫中艰难行进，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逐步兴起的历史条件下，由上海文化系统的中共负责人在日本东京的中国文化人和留学生中秘密建立的组织。此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细胞之一。虽然只是“细胞”一粒，看似微不足道，但因它的地位、作用有特别之处，影响久远，故它的历史活动不应当被忽略，而值得后来者，尤其是中共党史、革命文化史工作者重视。

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和留学生中，曾经建立过中共的组织，并一直保持与中共上海文委的联系，同时开展过许多革命活动，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史实。

广东省档案馆收藏有一封“路丁致博古信”，全文如下：

博古同志：

广州关系

梁威林同志，留日学生，在日参加社联及党，今年6月间回国，即恢复关系，调便衣队中工作一月余，经组织批准回广州。最近因广州组织情形混乱，又回上海，要求解决广州关系，兹与他详谈工作方法方式



外，并决定他仍回广州，组织关系一方面转到广东去，一方面与上海仍保持一通讯关系。

梁同志是一个新同志，由于在日本党内生活不健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人很忠实可靠，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很浓厚，对党的领导很能接受。在他周围（广州）有二十〔名〕左右的过去曾参加过日本文委党的组织，他们自立一个系统，现在都参加广州的救亡工作，并与广州“市委”有关〔系〕。据梁说，广州组织极混乱，“市委”和“南方局”对立，旧的工作方式非常浓厚，我们已和他做了一个初步的决定，不要和任何派对立，主要的是加入各派，了解各派情形，并转变各派工作路线。

这一关系，请转给领导广州工作的组织，我们认为在解决组织及工作上是很大的帮助。他的关系如下：

广州文明路，留东同学会，找梁威林（梁中等身材，脸黑，眼大略凹，广西口音）。口号：张登先生介绍来的，去人可先通信，地址是：广州一德路石室前泰盛烟行，邝启常转梁威林。约好时间。

路丁

十月卅日

旁注：已转广东了

这封信收录于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36辑，1986年12月印。这一套书，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中共广东组织的历史档案的汇编。原信的影印件，刊载于为纪念梁威林而编印的图册《岁月留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24页。从内容判断，此信写作于1937年10月30日。那么，写这封信的“路丁”究竟是什么人呢？读王尧山《忆在“左联”工作的前后》一文，只见其中写道：“（我）还用过‘路丁’的笔名，表达仅是革命大路上一

小兵……”（载《左联回忆录》第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可知“路丁”即王尧山。查王尧山的简历，知其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组织部部长，并参加左联党团工作，1936年夏天之后负责上海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1937年7月与刘晓、冯雪峰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而收信人博古，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这就很清楚，路丁致博古的信，是上海党组织向中央组织部介绍梁威林及东京支部在广州成员的组织关系的党内通信。信中所说梁威林“在日本参加社联及党”，“日本党内生活不健全”以及在广州有20名左右“过去曾参加过日本文委党的组织”的人员等语，说明当时在旅日华人之中，确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信中的旁注“已转广东了”一语，应为中央有关部门所批，意谓这批人的组织关系已经转往广东。这是关于中共东京支部的一则关键性史料。

综合现在所掌握的材料，中共东京支部是在中共上海文委负责人周扬的领导下，以林为梁（后改名林基路，1943年9月与陈潭秋、毛泽民一同壮烈牺牲于新疆）等人为骨干，于1935年秋在日本东京建立起来的，当时林为梁为书记。初期和中期的党员有官亦民、陈洪潮、陈健、梁威林、李云扬、张建、伍乃茵、侯甸、邝启常、蔡北华、梁薇娟、苏曼、黄维克、梅景铤、潘沃权、李隆等，党员人数后来增至50人左右，陆续加入的党员有胡成放、杨克毅等。当时，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和留学生有数千人，东京支部所能联系、影响者，约有500人。1936年8月，东京支部派组织委员陈健返上海，向周扬汇报请示工作。1937年4月至6月，林为梁、梁威林（宣传委员）等人先后回国，林于当年9月间被派赴延安，梁则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从事党组织安排的工作。林、梁离日后，东京支部由陈健负责。“七七”事变后，陈健率东京党员及留日同学30多人离开日本，于八月底九月初回到广州，遂通过梁威林向上海党组织汇报了东京支部成员在广州的活动情况，并“要求解决



广州关系”。此即上述路丁致博古信之由来也。经过上海、延安之间的一番联络，陈健、梁威林于是年底在香港会见了中共中央派来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文彬，联络了组织关系。随后，遵照张文彬的指示，由中共广州市委接收了东京支部最后回国的20多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这也意味着中共东京支部历史的终结。

虽然，东京支部的核心人物林为梁因牺牲未能留下他对这件事的说明，但是陈健、梁威林、陈洪潮、李云扬、蔡北华、潘沃权、张建、陈秋焕、胡成放以及何干之等人在不同的年代分别写过有关的文字材料，或留下相关的口述史料，并由陈健、梁威林署名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发表《回忆三十年代中共东京支部的战斗历程》一文。他们所写、所述的，基本情节一致，与路丁信中所言相契合。当年中共上海文委的负责人周扬还审阅并补充、修改了陈健、梁威林的文章，肯定这篇文章“写得不错”，“符合历史真实面目”。当然，作为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孤悬海外，上海、东京均处于非常状态，各自的活动都很困难，东京支部未免带有种种历史形成的缺憾，正如路丁信中所说“党内生活不健全”，其组织关系亦有不甚明朗之处，所有这些，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应苛责前人的。

作为中共的海外组织之一，东京支部的历史无疑有其特点和亮色，值得注意。

一、20世纪30年代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因“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变的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节节高涨。在这样的年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革命、抗日精英到日本去？为什么在负笈东瀛的人群中，会出现中共的支部？这本身就是个谜一样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中共东京支部成立之前，在东京已经成立了同为上海中共文委领导的左联分盟，跟着又成立了东京“社联”、“美联”、“剧联”、

“语（世界语）联”及“文化座谈会”等，总称东京“文总”。这时的东京，实际上已成为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左翼文化人在国内屡遭迫害打击之后的流向地和聚会点。东京支部努力根植于流亡东瀛的左翼文化人和留学生中，致力于开展进步文化活动，在东京“文总”各团体中分别成立了党小组，积极参与出版刊物，组织创作、演出、美展和学习讨论等一系列活动。因特定的历史际遇，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移师海外，异军突起于东京，并取得了鲁迅、郭沫若的指导支持，成为中国整个左翼文化运动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部分，继而融汇于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中，在全民抗战中发光、发热。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革命文化史不可缺少的一页，当然值得总结和研究。

三、东京支部、“文总”走出了大批杰出人物。对于那些在抗战爆发前后东瀛归来的人士而言，东京是他们上的一所特殊学校，是他们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革命驿站。他们在日本所学和所干的一切，实际上只是一句话：为抵抗日本侵略中国做准备。许多著名的抗日志士，其实是在中国的敌国——日本走出来的。他们自日本归来，即踏上了艰辛漫长的抗日之路，相继奔赴延安、新疆、海南及全国各地，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抗战文化活动和抗日统战工作。有的人甚至在抗日、革命中英勇牺牲，中共东京支部书记林为梁（林基路）就是其中之一。为抗日、革命献身者还有丘东平、蒲风、梅景铎、苏曼、罗文坤、黄日东、卫国尧、官亦民、陈仰哲等。从东京“文总”、支部走出来的人中，不乏卓有成就的小说家、戏剧家、画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和社科理论家，还有人长期工作在外交战线或隐蔽岗位上，为国家作出了许多有意义却罕为人知的贡献。

四、相对于对留美、留法、留俄的研究而言，目前学界对于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看来有所不足。所征编的有关史料不多，著述更为罕有。至于中共在旅日文化人和留学生中建立党组织及开展活动的情



况，更是少而又少。一部中共党史，只是在写到左翼文化团体活动地区不断扩大时，提到了“日本东京”几个字，可见这是党史征研的薄弱点之一。这一点，也说明应对有关的历史情况作一番整理和研究。

此外，读中共东京支部的史料，我们还有一点特别的感受，就是这个冠名东京的支部，其实是与广东革命历史有一定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当南方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时，在广州暗地里却出现了不少左翼文化社团，还有为数相当多的读书会 and 读书小组。当时不少新进青年为之吸引，想方设法加入，为参加其中的活动而甘冒坐牢杀身之险。东京支部、“文总”的人物中，有不少是广东人，或在广州上过学，教过书，当中就有左翼社团和读书会的成员。当读到有关史料时，我们直感到似是课堂的搬迁，读书会讨论地点的转移，老师学生一帮人彼此照着从广州挪到东京去了。后续的故事则是，当祖国抗战的呼声召唤时，他们又成群扎堆地从日本回到了广州。广州市文明路63号“广州留东同学会”就是他们的聚会点。许多人都知道，“广州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就是1938年1月发起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八个团体之一。东京支部的20多名党员，最终又是由中共广州市委接收的。此后在广东各地的抗日、革命活动中，到处活跃着“留东同学”的身影。所有这些，不都是广东、广州党史应当征集研究的内容吗？广州党史工作者之所以关注东京支部的历史，乐于征编研究有关的史事，原因就在这里。

这本书在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持下，在东京支部、东京“文总”后人的支持帮助下，经多方准备和多人努力，终于编讫。编委责我撰序，这让我颇为惶惑。然而，东京支部组织委员、后期负责人陈健，却是我的老师，这一点，又让我感到应当为此写点东西。陈健1926年在香港加入共青团，1930年代在广州国民大学读书时，师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干之，研究社会科学，并在广州秘密发起成立“正路社”。陈健

当年崇拜何干之，当何干之离开广州后，他想方设法寻找何的行踪，读他的著作，并从何的文章和言行中，推测到他可能是一位共产党员，遂更加坚定地成为何干之的一名忠实“粉丝”。为了追随何干之，陈健不顾一切，从广州一直跟到日本。这一举动，其实是一名青年学子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也可谓惊世骇俗矣。近时，陈健之子陈国汉兄给我送来了大批陈健的遗稿，多半是他在不同年代亲笔写的自传、自述和对有关经历的说明，当中有不少是与东京支部相关的。因为在东京的这段经历，让陈健受到了怀疑，在“文革”中还被审查过，他只好不厌其烦、反反复复地说明他与何干之、林基路的关系，在东京入党的经过，以及参加中共东京支部活动的情况，如此等等。清夜独坐，我一页页读着老师留下的这堆文字，可谓感慨良多。他们奋斗过、付出过，但被理解少而受苛责多，以往的奋斗与付出，只是一堆“交代材料”而已，读这些东西让人心里沉甸甸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然而，正是这些在被动、无奈的心境下写出的朴实和不加修饰的文字，反映了历史真实的一面，为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东京支部这一专题，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史料。这一点，又是应当感谢陈健老师的。

陈健老师谢世多年。这篇小文，也算是我这位学生对他的缅怀之作吧。

谨对不辞辛劳为本书的编辑、出版而努力工作的各位同仁，表示敬意。

2012年10月